

《海洋先驱唐世凤》近日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作为“中华海洋学人系列丛书”之一,该书以传记的形式,全面记录了唐世凤先生精彩的海洋人生:他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关联,将全部才华和学识奉献给了中国海洋事业。以唐世凤先生为主线,一大批科学家的业绩均有涉及。既有老一辈海洋科学家童第周、蒋丙然、朱树屏、张玺、林少文、伍献文、曾呈奎,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杰出海洋科学家赫崇本、方宗熙、毛汉礼、文圣常、侯国本等,这些闪光的名字站成了新中国海洋科学的第一方阵。他们开拓性的研究和发现,为新中国海洋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。在他们中间,唐世凤先生极具典型性。

唐世凤先生1903年出生于江西泰和县。虽系书香门第,但在唐世凤出生时,已是家道中落。一家人糊口尚且不易,根本谈不上读书上学。但聪颖的唐家少年热爱读书,从故乡出发,到吉安,到南昌,到南京,1928年9月,他走进了“国立中央大学”就读生物系。在那里,唐世凤遇到了业师伍献文先生。伍献文只教了他一年,但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。1932年伍献文举荐唐世凤进入“中央研究院”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,请他担任助理研究员。这是唐世凤走向学术工作的起点,伍献文带着他到厦门学习采集海产动物标本,唐世凤不仅结识了美籍教授莱德,还随渔民出海捕捉了“活化石”脊索动物文昌鱼。这种鱼由莱德教授于1923年在厦门刘五店海域发现,相关论文在美国科学刊物上发表后,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。1935年,著名海洋科学家张玺又在青岛胶州湾海域发现了这个“宝贝”。

自打唐世凤在厦门接触到文昌鱼后,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几年后,他和恩师伍献文在烟台、青岛海域相继采集到了这个物种的标本。1934年,唐世凤代表“中央研究院”参加了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,历时十个月,带回了大量软体动物、环形动物、寄生虫、甲壳类、爬虫类等动植物标本。其间,唐世凤沿着海南岛东海岸踏遍了文昌、嘉积、万宁、陵水等地。在完成生物采集和科学考察的同时,他还留心记录了当地的人文、民俗、语言、教育等信息。1937年,唐世凤还在浙江沿海及岛屿进行海藻调查。通过海洋调查与标本采集,他初步形成了“实地调查与文献相结合”的治学体系和研究风格。1937年4月,唐世凤考取留英公费生,进入利物浦大学海洋系深造。1939年12月,他以海洋贻贝的研究成果获得博士学位,并在利物浦潮汐研究所做了一年研究工作。1940年12月,唐世凤携妻将子搭乘一艘客货混装船,在海上漂泊了两个多月后在上海靠岸。留学归国后的唐世凤继续服务于“中央研究院”,被聘为中国地理研究所海洋学组副研究员。抗战胜利后,经唐世凤建议,“国立厦门大学”设立了海洋系,这是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,唐世凤被聘为系主任。他以博大的胸怀请来大批国内外顶级海洋专家、教授到校执教。一时间,厦大海洋学研究风生水起。

此时,“国立山东大学”也在布局海洋学科,酝酿成立海洋系、水产系。南厦门,北青岛,遥相呼应,海洋科学的航船蓄势待发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,山东大学海洋物理研究所与厦门大学海洋系合并,成立山东大学海洋系。9月,唐世凤带领厦门大学海洋系理化组两名助教、18名学生到达青岛。唐世凤在山东大学海洋系执教六年后,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海洋综合调查。在这次调查中,他的学生已经独当一面。1958年山大迁往济南,唐世凤留守青岛,继续在山东海洋学院供职。1962年3月,他兼任山东海洋学院图书馆馆长。

1971年8月唐世凤病逝,时年68岁。唐世凤先生一生专注于海洋科研事业,不仅成为中国海洋调查的先驱,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海洋科学家,如陈宗镛、周天华、陈则实、侍茂崇、施正铨等。改革开放后,他们已成为我国海洋领域的领军人物,海洋研究与海洋教学工作日新月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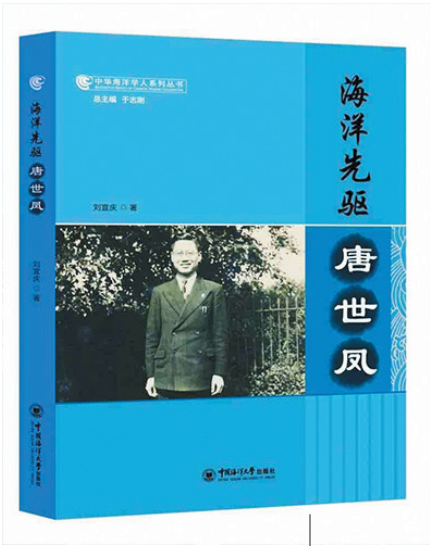
《海洋先驱唐世凤》一书紧紧围绕唐世凤先生的生命历程铺陈开来,时代的痕迹隐约其中。由此上溯百余年的历史细节跃然纸上,栩栩如生。该书作者刘宜庆先生再次展现出了对中国近代史的把控力度。刘宜庆是一位严谨的书写者,特别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梳理。为写作此书,他搜求了大量原始资料,访问了诸多当事人。诚如傅斯年所言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功夫不负有心人,本书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传主唐世凤先生的风采。另外,为科学家树碑立传,往往涉及诸多科学领域的知识,对于作家来说,面临的难度可以想见。但刘宜庆却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突破了这道屏障。阅读这本书,几乎没障碍。这一点,特别值得点赞。

作者简介:崔均鸣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島」
扫码关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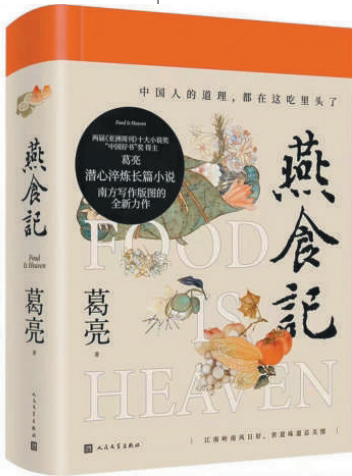
长风破浪 直挂云帆

——《海洋先驱唐世凤》简评

◇崔均鸣

《燕食记》：百年社会变迁中的庖侠传奇

◇张瑜



读罢作家葛亮的最新34万字长篇小说《燕食记》,心中只有四个字:叹为观止。个性鲜明、历历在目的人物群像,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的腾挪走笔,萃玉凝珠、灵光突现的细节刻画,草蛇灰线、遥相呼应的段落铺陈,粤港两地百年社会变迁被描摹得惟妙惟肖。

小说分为上下两阙,以叶七、貽生和五举师徒三代的传奇身世及薪火赓续,再现了辛亥革命至九七回归期间广州、香港双城如何砥砺前行。上阙自辛亥革命始至抗战胜利终,围绕叶七抗清、抗日及貽生的身世、成长展开故事,有广府大族太史第大宅里的觥筹交错,熙来攘往;也有安铺小镇密谋除寇的惊心动魄,血雨腥风;有闺中密友千金一诺,代育遗孤虽九死其不悔,也有仁人志士以身许国,留佳人青灯只影芳心难寄。下阙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写起,至九七回归,更多的是凡人日常与烟火滋味:貽生因师傅叶七亲传的“打莲蓉”绝活成为香港制饼行业领军人物,茶楼少年五举因善良灵气深得貽生喜爱,视如己出并亲传“打莲蓉”手艺。五举爱上女孩风行“入赘”戴家离开师门,同妻子、岳父一起打理自家专做上海菜的酒楼。后来遭遇妻子早逝,酒楼关张,黑帮闹事等重重困难,五举始终恪守着对家庭的责任不离不弃。最终,在五举岳父的葬礼上,十几年不能原谅五举的貽生,以一幅“江南岭南风日好,世道味道总关情”的挽联与徒弟和解。

叶七、貽生和五举师徒三代人,命运走向必然与所处的时世相呼应,诚如叶七所说:“谁都没法做局外人。”叶七如此,早年结社抗清,留下难以根治的病痛;抗日之声日炽,他又勉力集结民间力量共襄义举,在日本间谍河川守智就要逼近事实真相的危急时刻,亲自策划并借助貽生之手,以一块月饼锄寇于无影无声,留下了“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”的一代庖侠的江湖传说;貽生如此,他生于忧患,得享天年;国家有难,他随军跋涉,投身抗日洪流与国家命运呼吸与共;盛世太平,他精研厨艺,将粤菜制作手艺以及师傅叶七传授的制饼绝技发扬光大;五举如此,虽然不像叶七和貽生命途多舛,但他以诚恳和敬业撑起一家老小安居乐业的小舟,是香港经济腾飞的亲历者和奉献者。

师徒三代虽命运走向迥异,但在性格和处事上都有着“信”与“义”的任侠精神。叶七早年抗清留下一身病痛,不得不吸食鸦片缓解,自与慧生在一起后戒掉了鸦片,他跟貽生讲:“我应承过你母亲,牙齿要当金使。”貽生对于在太史第一起长大的向家七少爷始终忠心护持,暗中照顾;五举妻子早逝,他回绝了岳父母劝他回到貽生师傅身边的好意,以一己之力打理生意、照顾老人、教护妻弟。

中国的侠义之道,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家。为践行“兼爱,非攻”的理念,墨子不远千里面见楚王,劝他不要攻打宋国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序》称颂游侠:“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。”在漫长岁月中,“侠”与“儒”在匡正和指引国人道德行为方面成为并驾齐驱的两股力量,而“侠”的活泼与真挚的特质更加激扬了它的生命力与亲和力,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长盛不衰就是例证。

中国人素来信奉“民以食为天”,而就在这调鼎鑊,烹小鲜中,做人的道理也伴随着烟火升腾一点点地弥散开来。《燕食记》中,一辈子哀矜不显的慧生,用一碗“熔金煮玉”倾诉了自己的真情,有对叶七的爱恋,也有对年少伙伴貽生母亲月傅的怀念。这一碗粥,慰藉和挽留了叶七漂泊多年的心。打莲蓉月饼,叶七教貽生,貽生教五举,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:“要打好莲蓉,至重要的是哪一步?”答案是:“熬。”深锅滚煮,低糖慢火,再硬皮的湘莲子,火候到了,自然熬它个黏软没脾气。这是食文化的道理,也是做人做事顺应时代变迁的道理。这里的“熬”,是低谷时的耐心,是危难时的胆识,是中华民族历尽磨难仍生生不息蓬勃向前的根基。

难得的是,书中经常可见令人心动一动的细节描写,读之如或见野花,或遇蛱蝶,或涉秀水,或攀险峰,每每提升阅读的体验。比如月傅与慧生都是被送进尼姑庵的苦命女孩,月傅敏感柔弱,慧生洒脱刚强,两人情同姐妹。在遭逢大难,命悬一线,不得已仓皇出走的危急时刻,一边对月傅隐瞒真相一边心急如焚设法帮助月傅脱难的慧生“望一望她,没忘了让自己的神情松弛下来”。在大难将至,生死未卜的时候,仍不忘扮一副如常神态宽慰对方,得友如此,夫复何求。

《燕食记》作者葛亮,家世深厚,先后就读南京大学、香港大学,文学博士,香港浸会大学教授。他创作的《朱雀》《北鸢》曾入选《亚洲周刊》“全球华文十大小说”。2022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燕食记》是其最新长篇小说,书名取自郑玄注《周礼·天官·膳夫》:“燕食,谓日中与夕食。”燕食,意指大夫、士、庶人日常午餐和晚餐,与帝王的一日三“举”相对。记燕食,就定下了小说书写普通人的立意和基调。

作者简介:张瑜,媒体特约评论员。